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 中共中央北方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ISBN 7-80136-426-0



9 787801 364265 >

ISBN 7-80136-426-0/K · 373

定 价: 62.00 元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 中共中央北方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下册)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北方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中共中央北方局》  
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8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  
ISBN 7-80136-426-0

I. 中… I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华北地区  
—1927~1937—史料 IV. D23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7635 号

### 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下册)

《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

---

####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 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 100029

地址: 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 (010)64946059 传真: (010)649680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42.625 印张 1060 千字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 册

---

ISBN 7-80136-426-0/K · 373

定 价: 62.00 元

## 天津早期革命工作和顺直省委的建立

吕 职 人

1927年5月间，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天津方面推派安幸生、张宗一两人作为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返津后详细报告了大会集中力量批判陈(独秀)彭(述之)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经过。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而彭述之则被摒除中央政治局。大会后，中央派彭述之到北方筹备组织顺直省委，同时派蔡和森代表中央视察北方区的工作。彭述之先到北京着手筹备工作，蔡和森也到北京了解北方区及北京地委情况，并到山西、山东等省了解情况后来到天津。为了他的安全，天津地委指定在洋行工作的张锦城给他夫妇租了住房，其他同志都不知他的住址。蔡和森听了天津地委的工作汇报，又到唐山了解了工作情况。回到天津后，决定把顺直省委设在天津。经过酝酿磋商后，确定由朱锦棠担任书记，刘伯庄负责组织工作，彭述之负责宣传工作，王仲一负责工运，于方舟负责农运兼国民运动，仍兼天津地委组织部工作。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兼省委委员。这是当时的确切情况，省委委员另外还有谁？就不清楚了，省委秘书长是陈为人，我是秘书。朱锦棠原是中央派来北方做“济难会”工作的，工人出身；刘伯庄原在北方区工作，这次和彭述之一同由北京来到天津。省委机关设在英租界集贤里6号，我和陈为人住在这里，王仲一也住在这里，省委开会也就在这里。

蔡和森把北方区工作大致了解以后又回到中央，正值武汉国

民政府(汪精卫)叛变革命,宁汉合流,党在南方各地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屠杀,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党中央召集了八七紧急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解除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由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并作出决议,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南方发动秋收起义,组织农民暴动。

八七紧急会议后,蔡和森又来到天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布置北方区工作。省委命我布置会议地址。当时正值我二女儿出生不久,于是便以我女儿过满月为名,在日租界神户里××号,定于9月22日上午10时开会。传达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是在群众中,尤其在农民群众中,组织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秋收暴动。会后,首先布置玉田县的农民暴动,并成立了京东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由叶善枝任书记,机关设在唐山;还调了天津地委委员、小刘庄区委书记傅茂公去唐山任地委委员,主要做唐山赵各庄矿工的工作,以便配合玉田县的农民暴动,并兼任特委委员。特委委员还有张金言、解学海、杨春霖和乐亭中心县委书记李芳岑等。玉田也是中心县委,包括丰润、玉田、迁安、遵化等县,书记是张金言。杨春霖是丰润县杨弋口头村的农民在赵各庄作矿工的,因领导罢工被矿方开除,被组织派去参加玉田县委。他善于讲话,有很大鼓动性,与农民有共同语言。因此,张金言、杨春霖到各村活动,很受群众欢迎,玉田县的许多村镇迅速建立起党的支部和农民协会。这时,顺直省委又把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解学海和黄埔军校毕业的龙自立(又名刘自立,陕西大荔一带人)、赵搏、朱耀中派到玉田,准备暴动时做军事工作

党中央鉴于北方区遭破坏后必须迅速恢复工作,改北方区的名称为北方局,特派王荷波为北方局书记,与中央派在北方的蔡和森商议建立起北方局的问题。王荷波到津后,还亲自到过唐山,了解和指导唐山地委的工作,并亲赴玉田了解并指导农民运动工作。

北方局仍设在北京,由天津挑选一些干部如安幸生、郭隆真、

李希逸等参加工作；由东北调马骏担任北京地委书记；还有原北京地委委员未被捕的如李渤海等。这样，北方局和北京地委工作才得以恢复。但刚开展工作不久，于1927年11、12月间，北方局及北京地委又遭破坏，以王荷波同志为首，有18人被特务逮捕，遭到奉系军阀的血腥屠杀，郭隆真同志逃回天津，她说当时军警包围搜查，她躲进一个厕所，身上还带着几个文件，她把它撕碎一口一口地吞咽到肚里，因未搜查到厕所，她得以脱身。这18位被捕的干部本身均未承认在党内负有什么重要职位。由于李渤海的叛变，经他指出每个人有真实姓名和职务，以致除李渤海外均惨遭杀害，无一幸免。

顺直省委正式建立起来的时间是1927年7月底，地址在集贤里6号。大约是8月11日下午2点左右，省委委员兼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因前一天地委宣传委员粟泽被捕，粟泽的爱人是李季达的夫人王贞儒介绍的，他怕王贞儒受到影响，从省委机关出来到王贞儒所在的地方去通知她，然而密探已经在那里卧底，因而也被捕。地委整个工作受了影响。省委新建立的机关当然要防备出问题，于是把这一机关作废。这时，陈为人调赴东北沈阳工作，我就迁到日租界神户里去住，在利用这个地方召开传达八七会议的大会以后，这个机关也随即作废，我记得搬到了另租的仁寿里的房子。

1927年玉田暴动是利用旧历8月中秋节玉田城内集市日发动的。各路农民队伍趁着赶集，集中到城内约有3万人，包围了玉田县政府和玉田县民团总部，当即打死了民团团总吴殿三，玉田县长化装逃走。因当时省委对暴动的布置没有明确的战略战术指示，没有像后来毛主席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那样明确的目标，所以反动政府由唐山派出军队去镇压时，暴动队伍当即瓦解。张金言、解学海、杨春霖、刘自立、赵搏、朱耀中等都逃到唐山，并到天津向顺直省委作了报告。省委曾开过一次会，当时省委有彭述之、王仲一、于方舟和我（此时，书记朱锦棠、组织刘伯庄已调走）。彭述之表示玉田暴动还要继续搞下去，并表示他自己去玉

田恢复并领导这一暴动。于方舟认为彭是南方人，口音不同，不宜，不同意彭去，并坚持表示应由他去，因于是京东宁河县人。最后，会议确定由于方舟去玉田继续组织暴动。于方舟临行时下了决心，曾对他爱人谈芳荪说是党派他去莫斯科开会，至少要半年时间才能回国，让她先回老家去，等他回来再接她。于方舟同志去玉田后，由我派人把他爱人和两个女儿送到宁河县侯口老家。

在于方舟去玉田前几天，已是11月中旬，蔡和森来津准备召集一次30余人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和传达八七会议的人员相同，他们有顺直省委代表，天津、北京、唐山、保定地委代表，山西、山东省委代表，及京奉、津浦、京绥等铁路方面的代表。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开一个较大的会议确有很大困难。会议的场所还是由我布置，利用曾经用过的法租界文兴里的二层楼房子，下面是铺面，二楼是由后门上去的。这个房子当时已不能用，正准备退租而尚未办理手续的当口，作了最后的利用。

当时，京、津等地都处在奉系军阀张作霖和阎锡山矛盾冲突的中心，报纸宣传已达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仗打起来以后，就是当时所谓的“傅作义守涿州”的战役。当时，蔡和森在会上宣布了主要有两件事：一、他分析了北京、天津、唐山、保定以及太原、济南、绥远、张家口等地的党员人数，有的地方原来就不够健全，有的受到过摧残，群众组织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主观力量是不够强的。但因为军阀混战，加捐、加税弄得民怨沸腾，认为这个客观条件太好了，因此决定各地全面布置暴动，同时各地党委就现有组织一律改称特委。为了发动农民暴动，过去的减租、减息、减税的口号，改为抗租、抗税，具体口号为：“不交一粒于地主”，“不纳一文于官厅”。二、从现在起国民党的工作不再做了，参加国民运动的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原来脱产工作的同志，自行设法找职业。会后各地代表又分别与蔡和森商谈后都陆续回去了。于方舟也立即到唐山同特委叶善枝、张金言等开了特委会议，研究布置了鲁家峪的暴动计划。

不久，顺直省委获悉鲁家峪暴动失败的消息，并知道于方舟、杨春霖、解学海、刘自立 4 人连夜赶赴玉田准备继续组织暴动，途经丰润县境内丰玉交界处的沙流河镇，仓卒间被民团逮捕，解往玉田县监押，于农历腊月 22 日拂晓前押往玉田县南门外枪杀。于方舟等同志就义时，一路上高呼口号，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县城居民。

顺直省委在获悉暴动失败，同志被杀的噩耗以后，开了一个会。这时，省委只有彭述之、王仲一和我 3 个人。彭述之由右倾机会主义一下子又转到“左”倾盲动主义，他批评这次暴动又犯了右倾的毛病，主张暴动起来以后，哪怕只剩下 1 个人也要进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王仲一当时严厉地反驳了彭述之的意见，并说目前只是得到消息，具体情况尚不了解，不应出此不妥当的结论。

就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来说是不平衡的。南方经过北伐战争、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的锻炼，党的战斗力和群众斗争情绪都是比较强的；而当时北方的情况就不同，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都比较薄弱。

经过玉田县两次暴动和挫折，张金言等同志暂住唐山等待分配工作。玉田当地有些干部因白色恐怖严重，大部分同志已隐蔽起来。摆在当时的任务是必须迅速把玉田、丰润、遵化、迁安等县的组织和组织恢复起来。我是丰润县人，当时向顺直省委和蔡和森要求，派我去恢复各县党的组织和组织。经过允许，在农历年前，也就是 1928 年初，于方舟等 4 烈士牺牲不久，我先去玉田了解情况。经唐山时由张金言介绍玉田一些情况，他告诉我先到鸦鸿桥找霍沛然，因霍在该镇开一小饭馆，不会受到暴动的影响。

我到了鸦鸿桥镇，立即接触到霍沛然本人和他的弟弟霍愈然，还有叶宝山、关子文、陈允武等几个人。他们说原县委委员宋哲三还在家。得到了这些线索，我认为情况还好，于是将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南方特别是江西一带秋收起义取得胜利的情况告诉给大

家，要大家安心，并表示我回天津去向顺直省委汇报后还要回来把县委及各支部工作恢复起来，和大家一起继续干下去。还请他们设法把知道丰润、遵化方面还有那些同志的线索搜集起来。大家的情绪很安定。就这样，我在农历年关前又回到天津，向顺直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我以特派员名义负责把玉田、丰润、遵化、迁安、蓟县等的工作和组织恢复起来，准备过旧历年就走。

这时，蔡和森找我，谈到他去中央后，从中央获悉彭述之有派别活动，要我抽空前去北京，找北京地委了解一下他们知道的彭述之的活动情况。当时北京党组织经过几次破坏，仅有几个人在那里维持，只能相互个别接头，经常更换接头地点，开个会很困难。所以，我只和李希逸接上了头，谈了一下彭述之的一些影响，返回天津后向蔡和森作了口头汇报。过了几天，蔡和森把船票买好了，对彭说中央要彭回上海去。

旧历年关过后，我把家搬到唐山，略作安置，即刻投入到恢复玉、丰、遵、迁、蓟等各县工作的战斗中去。

这时，顺直省委只有王仲一 1 个人了。在机关工作的还有郭宗鉴等人。天津地委工作实际也是由省委在那里维持。地委交通李志新自己找到了职业，在一书店里工作。这时蔡和森既要重新组织顺直省委班子，又要选择代表，准备参加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工作是相当繁重的。但经过他的努力，很快又把顺直省委组织起来了，六大代表也选定了。北方各地的革命工作又重新振作起来。

由于时间相隔久远，现在回忆起来确是搜索枯肠，挂一漏万，不甚确切之处也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 附 记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字芳洲，简称方舟。因参加过“五四”运动，未得到直隶省立一中的毕业证书，后来借用了本家于绍舜的毕业证书考取南开大学。

江浩，字注源，简化常写竹元，当时未见过著元这个名字。

李永声，原字立三，因党中央领导人李有立，故改字锡九。

“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天津最初成立叫“国民会议促进会”，因全国各地都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所以天津后来也改称“促成会”。

（选自《中共顺直省委》，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 1927 年玉田农民暴动

张 明 远

国民党叛变后，为响应八一南昌起义，组织全国秋收暴动，北方局书记王荷波来玉田县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指示玉田县农民武装暴动。玉田县党组织执行中央这一方针，计划利用双十节武装示威，检阅自己的武装力量，当即借新旧县长交替的机会以欢送旧县长为名，在东关聚集了全部农民武装共 2 万多人（其中一小部分有步枪）。张明远等人借欢送登台讲话，意图是检阅和显示农民的力量，为武装暴动作准备，也是直接给新县长一个下马威，令他对农民的革命活动不得加以限制。这次检阅王荷波也参加了。会后从东关到西关举行了游行示威。

自这次检阅和示威以后，新任县长采取了镇压手段，抓捕我农会负责人，并企图将原来已取消的捐税完全恢复。在官民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中心县委决定立即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当时未召开什么正式会议作周密计划），连夜往各区村农民会发下通知，赶快组织武装，分成东西两部集合（东以东八里铺、西以三里屯为集合地点）。共两天时间全县共集合两万多人。临时宣布“捉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保护工商界，公买公卖，不许抢掠”等几条纪律。就开始由城东、城西两边攻城，县长害怕了，派恶霸吴殿三向农民讲话，但农民不允许其讲话，中午将县城包围。此时，城内警察和保安队全部上城，双方发生了战斗，但时间不长，农民起义军将城攻破，拥入城内，解除了警察和保安队的全部武装（缴步枪 100 多支），占领了县城。对一般官兵缴械后经教育都释放回家了（为首的贪官污吏豪

绅跑掉了)。这次进城的纪律较好,城内工商业以及居民未受任何损失。

玉田城被农民起义队伍占领的当天晚上,杨春林、叶善之(当时是省委代表)从遵化带五六千人来支援玉田农民起义。张明远、杨春林等就此机会想建立政权,扩大武装力量,但叶说:“孤城难守”,主张解散农民起义队伍。并说:“暴动起来以后农民要解散,干部要潜伏,此起彼伏让敌人找不着目标。”次日拂晓,强迫农民队伍返到郭家屯。在他的影响下,有一小部分群众思想产生动摇自动回家。但干部和大多数群众认为占领了县城再解散太可惜,愿意干下去。因此,在郭家屯又开会研究下一步计划。经研究决定:没武装的暂时回村在当地坚持斗争,解除地主和警察所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逮捕农民最痛恨的地主土豪劣绅,抄他们的家,把房地文书和浮财由农会掌握,分配给农民;有武器的200人左右,全部保留下来称为农民军,继续和当地警察所、豪绅、地主、民团进行武装斗争。会议通过了临时纲领,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取消警察和保安队;取消一切苛捐;旗地无条件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成立农民政府和农民军队(后曾以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拿了这个计划与叶善之请示,他说:“你们暂时可以先这么办,我去省研究一下,以后你们听指示。”

农民军建立以后,以郭家屯为基地,开始向警察民团地主豪绅展开斗争,曾先后剿了吴殿三和果各庄王文等地主的家,将浮财分给农民。活动不久,军阀派来两个团的兵力向农民军进攻,此时由省委派来的于方舟(省委代表)带几个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到了遵化。接到他通知后,农民军到遵化北王爷陵休整,将队伍改编为京东人民革命军,杨春林任总司令,张明远任总指挥,刘自立任总参谋长。并作出了攻取计划:第二次夺取玉田城,一路上扩大队伍,收缴警察所武装,发动群众捉土豪劣绅。行军路线是经平安城、官里、

亮子河、鲁家峪由玉田东进城。

当部队行到平安城时已是拂晓，我军将该镇包围并趁集日派小部分人带粮混入镇内，先控制了敌人岗哨，随即以突袭的方法将该镇攻破，打死几个警察，缴获步枪几十支，没收了税所所有税款，但首脑人物已跑掉未捕获。部队行到鲁家峪宿营，当晚有群众向我们报告说：“东峪有地主刘玉黎为人极坏”，于是立即派人前去抓捕，但因其提前有准备，与我们发生战斗，当晚未能捕获，准备次日再去。刘玉黎连夜串通了吴殿三等人以剿匪为名组织了周围数十村的地主武装、民团约两千多人，于次日拂晓将我军包围在鲁家峪的几个院子里。我先分兵把口，哪里发现敌人就派兵抵挡。由于我们的地势劣于敌人，再加上军队没有战斗经验，不久就被击破。于是，杨春林、于方舟等人率领部分人突围，由张明远率领一部作掩护。待杨春林、于方舟等人突出去以后，张明远等人已难突围，由一家农民掩护直到夜晚才撤出。在这次突围中牺牲了一部分负责干部，如萧林卿、郭其玉、李桂林等人突围后，在沙流河附近被民团捕去。后送到玉田城内拘押。1928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同志，遭敌惨杀。

张明远等同志撤出鲁家峪后，又集合了原来的武装100多人，成立了游击队在玉田县进行活动。此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决定争取玉田县及遵化县两部分土匪，除玉田一部分参加我们的游击队外，其他大部土匪看到我们兵力很弱，表面同意接受我们的委任，但实际与我疏远。因此，孤军活动了一个时期，由于参加的土匪不讲政策，随便烧杀抢掠影响了游击队的发展，又加上敌以两个团的兵力围剿，游击队被击散。此时，京东特委书记叶善之指示，暴动已失败，活动困难，待恢复其力量时再干。调张明远到天津工作，第一次武装暴动到此失败。

此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由于部队临时组成没有战斗经验，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

警惕性不高,再加上军队日夜行军的疲劳,偏重于恢复疲劳,没有随时注意战斗的准备。

二、暴动后孤军作战,没有利用乡村的农会组织发动群众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单纯地强调军事行动以夺取县城为目的。

另外,大革命时期党内斗争也很激烈。1926年农民斗争刚开始,就有部分党员怕运动,思想动摇,后来到运动深入发展时,有些知识分子党员,思想表现极为动摇,反对农民斗争和暴动,右倾机会主义确实很严重(这时正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后来有的贪生怕死,消极脱党。到国民党叛变时,有些人投降了国民党变成了反革命。

1959年访问回忆

(本文节选自《大革命时期玉田党组织的建立与斗争情况》一文,标题系本书编者所加。原文载1992年4月《河北党史资料》第12辑)

## 记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期干训班

纪 幼 柏

在谈干训班以前，首先介绍一下我点滴了解的当时省委情况：党的五大闭幕后，中央指定出席五大的东北代表邓和皋和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负责筹建满洲省委，以邓为主进行之。邓那时是大连市委书记。据邓讲，他到省委担任工作后，是确定了在武汉的陈达民（现名陈涛）来大连，接替邓为市委书记。邓1927年6月初，从武汉回到大连，正在筹建省委之际，大连党于七月下旬，遭到了大破坏，邓被捕入狱了。

1927年10月，中央和北方局派陈为人来东北，筹建省委。在哈尔滨把省委架子搭起来后，就到沈阳市设立省委机关。省委初成立的负责人是：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王立功、宣传部长吴丽石、工人部长唐宏经、军事部长胡谦之（又名胡步三）、团省委书记张任光。

省委计划到1928年6月底，全东北党员发展到500人。

我知道这时哈尔滨地委已改称滨江县委，书记是陈达民。陈是从中央派回来后，到大连和我联系，因那时大连党团遭到大破坏，我介绍他去哈尔滨找吴丽石的。吉长县委书记是陈一仁（原在大连市委担任组织部长）。旅大地区逐步恢复党团组织，成立了关东县委。中共关东县委书记是苗文秀、团县委书记是纪幼柏（即我本人），我原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

省委成立后，我去汇报了一次工作，是吴丽石代表省委接受汇报的。我原在哈尔滨工作时和吴熟识。

省委成立不久，很重视训练干部。于1928年春节前后用半个月时间，举办了省委第一期干训班。从各地调来骨干10多人（记不准十几个了），在沈阳市大东门外一个单独院落里，集中那里住宿、上课、讨论。管训练班的是一个马同志，老马原在一个县里当教育局长。学员不准外出，不准互通姓名和所在何处工作，这是采取的严格保密措施。旅大地区是曲文秀和我两人参加这次学习的。那时党的经济条件很困难。正当过春节，也未休假，也未加点菜，只吃顿饺子。天天吃高粱米饭、萝卜白菜，生活真苦，可是大家毫无怨言，努力学习，情绪很好。

这期训练班，讲的课程是：（一）马克思列宁主义，陈为人讲。（二）职工运动，陈为人讲。（三）怎样做宣传工作，吴丽石讲。（四）党的建设，吴丽石讲〔基本是根据罗亦农写的无产阶级政党之建设的小册子讲的。〕（五）妇女运动，吴丽石讲。（六）青年运动，张任光讲。每课讲完后，我们就互相对笔记，然后就讨论。吴丽石参加过两次讨论。张任光也参加过讨论。大家对讲的课程，很感兴趣，因讲的正合我们当前工作需要。老实说，我们总有强烈的革命意志，都很缺乏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工作能力。这次干训班，虽然时间短，课程只有六题，却感到收获很大，增加了工作信心。

1982年8月19日

（选自《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